

# 小报告解决大问题

## ——毛泽东推荐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

胡鹏飞 王思文

1941年9月14日、15日，延安《解放日报》分上、下两部分刊登了一篇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这篇调查报告由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并推荐发表，他还亲自撰写按语，称“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这是一篇什么样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会得到毛泽东的极力推崇？

### 一次关于边区运盐工作的调研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盐作为当时边区的重要资源，对外运销对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41年5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

对于这个决定，有些群众不以为意，更有些干部顾虑重重，认为此举得不偿失，导致运销食盐工作进展缓慢。

为深入了解运盐工作情况，以便制定相应政策，毛泽东让西北局的同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限3天内完成。8月13日，这项工作落到了当时在延属十县工委做秘书工作的高克林身上。

由于时间紧迫，高克林接受任务的当晚，便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开调查会，开始了这次调研。

### 摸清情况，抓住问题

在调查会上，高克林非常善于抓住问题，并敢于直击问题“靶心”：一不回避区乡同志工作上的不力，比如，“四乡杨万保‘要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有及时注意检查，和他谈话，也没有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三头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二不为困难找借口，比如，“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

一两站蚌蛭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蚌蛭地方晚上走，水少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之忍耐，困难就都可胜利地克服了”，等等。切实做到了奔着问题去、把情况搞清楚，为接下来写好调查报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 细致入微，一目了然

13日当晚，高克林根据记录概要整理运盐者的沿途经过、沿途困难、经验教训等，写成一篇调查报告。

在表述途经各地概况时，调查报告不仅详细记录了道路的路程情况，还把沿途草的分类、价格写得清清楚楚。比如：“芦家角至乱石头川，在沟里走，有兵站，买草（每百斤山草三十元，谷草五十元，麦草四十元）。”“乱石川至三里庙八十里，有兵站，干草每百斤五十元。”……

在表述沿途生活情况时，高克林写道“给店里柴火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还分析出这“完全看你你和店掌柜的关系弄好或弄不好来决定”……

在表述理赔问题时，不仅精确到每头驴身上，“若每驴能驮一百五十斤盐，按现在盐价每驴保证赚钱一百元以上。”还指出脚步的所言非实，“说二、三、四乡每驴只驮一百一十斤，一乡驮一百三十斤是脚踏说的，一定‘打埋伏’——因这区一般驴子可驮一百五十斤。”他还分析了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的花费情况，指出“则每头驴可省五十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类似这种细致深入的表述在文

中随处可见，让人读来明明白白、一目了然。

### 文风简洁，平实自然

第二天，高克林派人将调查报告送往延安。这篇调查报告整篇没有“穿靴戴帽”，没讲一句运盐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是开门见山，上来就直奔主题。

调查报告全文虽然不足3000字，却谈了七大方面近40个小内容。七大方面内容为：（一）应去驮盐的牲口未征集够的原因；（二）运盐往返的天数、路程、站名及各地概况；（三）沿途的困难；（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发生的问题；（六）附注（即费用和理赔问题）；（七）经验教训。

七个大方而下的小内容，大多就是一两句话的表述，基本都是“干货”，通篇没找到一个形容词、一组排比句和一个多余的字。但读后，人们对鲁忠才运盐时的路况一清二楚。如“鄜县至张村驿七十里，有五条沟，路难走，水草好”“张村驿至烂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好走，（可以）割草喂牲口”等，平铺直叙，不拖泥带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 这次调研有力推动了边区运盐工作

高克林在调查报告中指出，一头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15元；好驴赚得多，弱驴赚得少，这就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了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六百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得出了“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

# 冯其庸引导二月河

崔鹤同

20世纪80年代初，原名叫凌解放的二月河，把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的心得梳理了一下，写了《史湘云是“禄蠹”吗？》等自以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一篇篇满怀希望地寄出，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年轻气盛的二月河就写了一封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信”，寄给时任《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冯其庸：“红学是人民的，不是你们几个红学家的。”随之，冯其庸作了一些编辑，二月河的一篇论文很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

后来，冯其庸发现他是一块璞玉，很是满意和赏识，收入门下，推荐为中国红学会会员。从此，师徒俩就开启了数十年的贴心交往。

看到二月河好学上进，研有成果，冯其庸举贤荐能，二月河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红学会理事，且邀请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会后冯其庸与二月河谈话：“你的文章我已阅读不少，我认为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你搞文学创作

的成功机会会大一些。你的文笔很好，是写小说作品的手法，更适合这个门类。”二月河听后说：“我一定好好选择突破方向。”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一些学者由《红楼梦》谈到曹雪芹，由曹雪芹谈到其祖父曹寅，由曹寅谈到康熙皇帝。座中有人感叹，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写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问世，真是遗憾！这时，一旁默不作声认真聆听的二月河突然灵光入窍，暗下决心：“这是个好题材，我来写！”对于二月河的想法，冯其庸不认为是胡思乱想，一时兴起，便从各方面支持、关注和鼓励他创作。

二月河在查阅资料、搜寻史证、化为己用的辛勤创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苦闷和疑惑，都愿意向冯其庸倾诉，冯其庸为他找资料、出主意、答疑解惑、排除干扰，一步一步实实在在地帮着，尽自己所能、毫无保留。二月河没有写小说的经验，怕写不好。冯其庸

说：“谁生下来就会走路？你只有写出来才知道行不行啊。”

二月河刚创作《康熙大帝》时，有人说：“《康熙大帝》是个外来词，本身就讲不通。他深受打击，不知路在何方。冯其庸为他鼓劲：“别人说你写不出来，你写出来了，就成功了；别人说你写得出来，你不努力，说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不要受别人影响，不要打乱自己的思路，写出来不行再改嘛，有什么了不起！”冯其庸的大力支持，让二月河信心大增。后来写到30万字的时候，又写不下去了，彷徨之际，他希望冯老帮助看看稿子。

当时是1984年3月，冯其庸带着研究生外出学术考察，历时两个月，从鲁苏沪，再到鄂川陕豫，他览长江黄河流域诸多胜迹与壮丽山河，寻访历史文化遗迹。最后到达南阳时，冯其庸特意去看望二月河，并应其请求审阅他的《康熙大帝》书稿。

当时，二月河写的数十万字草稿，连勾带画，此转彼接，眼花缭乱，生人看了很是费劲。于是他连夜

赶工，提前誊录了十章给冯其庸看。冯其庸看完拍案叫好，当即表态：“你的什么《掖红集》，还有什么红学论文都不要弄了，这样就好，这就是你的事业。写完马上告诉我。”“不要再干其他事情，专心致志完成它，这是你的路。”

书稿准备出版时，冯其庸又打电话为他推荐出版社。《康熙大帝》首卷出版，二月河却受到了评论界的否定和工作单位领导的批评。在他陷入低谷之际，又是冯其庸给予了巨大的鼓励与支持。二月河从1984年起，用4年时间完成了4卷160余万字的《康熙大帝》；1990年至1992年，他又创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余万字，1994年至1996年，他又以惊人的速度推出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计130余万字。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他出生于1945年秋，那时他父亲参加“上党战役”，解放了长治市，且面临全国解放，父亲和战友们就“合议”起了“凌解放”这个名字，谐音就是“临解放”，盼望和迎接全国解放。《存官》写成后，二月河认为历史长篇小说署“凌解放”这个本名，一个历史一个现代，明显不协调，于是就顺着“凌解放”，想到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冰凌融解，不正是人们看到的二月河的景象吗？二月河，又特指母亲黄河河，是提醒自己要数典忘祖。从此，二月河也开了帝王文学创作的先河，在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于右任的“铁箱”之谜

周惠斌

“民国元老”于右任早年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监察院院长等要职，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参与创建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名校，他公正廉明、一生清贫，不住豪宅、不坐豪车、布衣粗食，书法写得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彰显出两袖清风的襟怀。

于右任生前用一个铁箱放置私人物品，平时秘不示人，他曾对亲友表示，铁箱要等自己去逝后才能打开，因此，里面放置何物，始终无人知晓。而人们多以为，铁箱里一定放着他的遗嘱和财宝。

1964年11月10日中午，于右任生命垂危，在他弥留之际，长子于望德和时任台湾当局“监察院”副院长的李嗣堃等人，为了找寻他的遗嘱，一起打开了那个铁箱。然而，展现在大家眼前的不是金银珠宝、股票证券，而是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并辗转送

到台湾的一双布鞋，以及他的一些重要日记、信札和欠款账单，其中包括幼子于中令留学时向他人借款的单据，平时因手头拮据而向跟随他40多年的老副官宋子才零碎挪借的3万多元借条。

人们难以相信，于右任位高权重，可他在台湾时期常常为生计发愁，以致病了无钱住院。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述：“开支甚大，如何能继？”“春节将近，费用太大，将如之何？”耄耋之年患牙疾，牙医建议他安装假牙，却因付不起8000元医疗费而作罢。

当亲友们看到铁箱里的这些珍藏的“宝贝”时，无不为之惊呆了，就连一旁的记者也不由得发出“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的感慨。记者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写道：“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赞誉于右任高风亮节、为官清廉的品格。《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颂于右任：“清廉厉风骨，典型在夙昔。”

## 郑振铎童心未泯

顾燕

郑振铎非常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其子郑尔康说他余暇不仅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还会和他们在一起“爬呀滚呀的，或是去公园里比赛爬山、划船”。郑振铎的好朋友叶圣陶回忆朋友们集会时轮流讲故事，“轮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郑振铎由此得一雅号“大孩子”。

五四时期，郑振铎接受了“儿童本位”论的思想，他对当时中国儿童读物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儿童读物的论文，其中包括《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22年，24岁的郑振铎创办《儿童世界》，被业内称为“中国第一本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在中国少儿期刊史乃至出版史上都

具有重要意义，后来的专家评价它是“中国第一本儿童文学期刊”。

郑振铎曾指出：“我们如果把科学未废止以前的儿童读物做一番检讨，我们便知道中国旧式的教育，简直是一种罪孽深重的玩意儿，除了维护传统的权威和伦理观念（或可以说是传统的社会组织）以外，别无其他的目的和利用。他们是很早地便在训练‘顺民’，一个小小的‘顺民’。”“把儿童看作了缩小的成人，而以教育成人的教育材料和方法整个搬到儿童身上。”

以郑振铎为骨干的青年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儿童文学运动”，以创作为中心，并在理论、翻译、编辑等几个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圣陶说：“他的性格总是像孩子那样直率，像孩子那样天真。”

## 高晓声的扫兴之举

周二中

高晓声是著名作家，但脾气很怪。作家叶兆言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吃螃蟹，林斤澜、汪曾祺夫妇、叶兆言和高晓声全家都在。文人相会，除了酒菜，还要有笔墨。大家都知道汪曾祺能写善画，文房四宝早准备好了。汪曾祺年纪也最大，于是毫不客气地挥笔画螃蟹，众人看了都喝彩。

画好了，为了留念，大家决定都要在画上签名。在场的人一个个都签了名，最后一个高晓声儿子。那时候，高晓声的儿子还在上中学，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有些怯场。

高晓声见状，低声对儿子说，写坏不要紧，字写大一些。他同时用手势比画着位置写多大，并告诉儿子具体签什么位置。

但高晓声的儿子还是紧张，后来虽然签了，但字大小。高晓声一见，勃然大怒，连忙取来了一支大号的毛笔，沾满墨汁，在已经完成的画上扫了一笔。一幅画就这样毁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汪曾祺更是脸上挂不住。叶兆言后来解释说，可能高晓声自己是名人，因此对儿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忍受不了儿子的示弱。

当然，也许高晓声当时酒也喝高了。

## 福庚的“新安江”三部曲

王荣 王抒滢

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将新安江水电站建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56年计划项目。1957年4月1日破土动工。1959年4月9日，周恩来视察建设工地。1960年4月，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水轮发电机投入生产。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力发电站，被誉为新中国水电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

1958年1月，为了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崭新形象，“工人作家”福庚（原名樊福庚，笔名：福庚、肖林、望云）到新安江水电站体验生活，历时近4年，先在工会和广播站，后下到潜水员班，又到安装队担任副大队长，并写了很多以新安江水电站建设为题材的作品——诗集《新安江之歌》、小说散文集《新安江春讯》、报告文学集《光芒万丈新安江》。

从1956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陆续赶赴建德县，加入新安江水电站的施工建设。29万水库移民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最多时有2万余名建设者在工地忘我劳动，周恩来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这让福庚热

血沸腾、诗情满怀。他天和工人们在一起，写出来的诗首先读给工人师傅听，倾听他们质朴的意见，不断地修改和提炼。他创作了百余首现代短诗和组诗，辑成的诗集《新安江之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2017年，浙江省作家协会《我们的文学梦·浙江当代作家群像志》纪录片摄制组采访时年已86岁高龄的福庚，他感慨道：“多少年过去了，晚上还经常梦回新安江，那些机组发电时的轰鸣声，让人多么怀念那个火红的年代啊！”

《新安江春讯》是小说、散文合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发行。收录福庚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著短篇小说9篇与散文、特写5篇。此书作品绝大部分是描绘新安江水电站工地生活和建设者的精神风貌，其中有短篇小说《新安江上》。张骏祥根据福庚的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新安江上》在《中国电影》杂志1958年第12期上发表，张骏祥编剧、徐昌霖执导的电影《新安江上》，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并在全国上映。福庚创作的报告文学《光芒万丈新安江》在《人民文学》1964年第9期上发表。1965年，报告文学集《光芒万丈新安江》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出版。